

从荒野到全球视野：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研究评析

陈良泓¹

(1.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 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全球领先的环保非政府组织, 其理论与实践对全球生态保护具有深远影响。探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跨地域、跨国界的发展轨迹, 能够揭示其如何通过跨学科合作与多领域实践, 形成一套创新性的保护策略。在大自然保护协会取得成功的归因解释上, 机构的自我革新和广泛的社会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 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各地开展的保护性实践中, “荒野”保护理念作为其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始终得到贯彻, 而全球环保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则是提供了明确的历史背景与时间线索。

关键词: 大自然保护协会; 非政府组织; 环保; 生态系统; 社会合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52

自然环境保护的浪潮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而日益高涨,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全球范围内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和保护行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紧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作为非政府组织, 在进入不同地区和国家环境保护领域后, 必然面临着诸如生态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与当地社区协作等一系列挑战。换言之, 大自然保护协会必须适应不同地域的环境政策和文化差异, 与当地社会互动并整合资源, 以实现其保护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自然保护协会逐渐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

伴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 学术界逐步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环保实践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纳入到各自的研究议程中, 并将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中。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理论模式与环保策略之间相互作用影响, 在一系列环保实践的过程中最终得以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环境治理的结构塑造、策略发展和政策实践。从二十世纪早期环保意识的觉醒, 到今天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环保项目实施, 该组织的研究和实践呈现出跨学科、多领域的多样化状态,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从早期以荒野保护为导向的行动, 到后来对社会参与与可持续发展的强调, 再到当前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和政策创新的深入探讨,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与发展, 映射了非政府组织对全球环境变迁和社会需求适应性的演进。面对如此拓展潜力巨大的研究领域, 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历史演变、实践路径及理论框架的相关研究, 并对其展开深入评析, 以期环境保护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学术研究提供洞察。

一、协会沿革：跨地域、国界的 NGO 组织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历史演进映射了环保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轨迹。在环境科学研究、国际关系学、发展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中,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跨区域、跨国家发展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者们从多样的学术视角出发, 运用多种理论工具, 认识到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组织历史并非单一线性叙事, 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演进过程。具体而言,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发展历程可以通过组织演化(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策略适应(Strategic Adaptation)、国际扩散(International Diffusion)和跨界合作(Transboundary Collaboration)来综合描述。这些概念共同勾勒出大自然保护协会如何从一个地区性环保实体成长为具有全球行动力的非政府组织。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组织演化反映了其结构和功能的逐渐成熟。比尔·伯查德(Bill Birchard)认为大自然保

护协会的机构发展反映了其从一个小规模、机会驱动的组织向一个大规模、使命驱动和系统化运作的组织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大自然保护协会不断调整其结构以适应新的挑战,增强其功能以开展更有效的环境保护。^[1]而约翰·索希尔(John C. Sawhill)则将大自然保护协会成长过程体现在其科学基础的方法、非对抗性的市场策略、合作伙伴的广泛参与、对当地社区需求的关注,以及对经济和生态保护兼容性的探索上。此外,大自然保护协会还通过增强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项目来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挑战,并扩展其景观级倡议以确保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保护。^[2]

安娜·威洛(Anna J. Willow)通过大自然保护协会与北美另一个著名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对比,意识到大自然保护协会从最初的科学生态学保护组织逐渐成熟为一个综合性的环境保护组织,这种成熟体现在其保护策略的扩展,即从单一的保护未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到接受和整合人类活动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使命陈述虽然变化不大,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强调保护对自然和人类都有益处的景观。而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实践也从过去的“活体博物馆”概念转变为现在的“工作景观”方法,体现了其保护工作的包容性和综合性。^[3]

策略适应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面对不同环境和管理挑战时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斯蒂芬·查普林(Stephen J. Chaplin)通过对协会自然区域项目的考察,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面对不同环境和管理挑战时,展现出了高度的策略适应性和创新性,这种适应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结构的转变上,还体现在保护措施多样性和与社区的合作上。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工作不仅仅关注生物多样性,还考虑到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力求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通过与当地社区的多层次合作,大自然保护协会得以更高效地实施其保护措施,在此过程中也提高了当地社区对保护工作的认识和参与度。^[4]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国际扩散展现了其如何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范围,在拉丁美洲、亚洲、欧洲与非洲都建立其分会或附属机构,并进而影响和推动了国际环境保护议程。环境非政府组织(Environmental NGOs, 简称 ENGOs)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量大幅增长,规模迅速扩大,影响力与日俱增。ENGOs具有全球性、非政治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等特点,它们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聚焦跨越国界的环境领域项目,与不同社会部门合作,以及培养和吸引专业人才,有效地扩散其影响力。^[5]比尔·伯查德的研究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国际扩散不仅体现在其组织机构的扩张与保护范围的扩大,还体现在其对国际环境保护议程的推动和影响。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将其模式和影响力扩展到全球其他地区,在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大自然保护协会注意适应当地文化和环境需求,通过与当地组织合作,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1]179-235}

罗伯特·莫斯利(Robert K. Moseley)和蕾妮·马伦(Renée B. Mullen)在对大自然保护协会国际扩散的积极性进行肯定的前提下,还看到了其受到的争议与项目实施的缺陷。此前,部分学者批评了包括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内的跨国保护组织,认为它们偏好“原始荒野”,而牺牲了发展中国家土著人民的文化和生计。而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将其保护工作深入到具体的地区性项目中,这体现了其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可以说,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国际扩散是一个不断适应和扩展的过程,它不仅将其保护理念和实践传播到全球不同地区,还面临着与当地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融合的挑战。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中国云南省的工作经验表明,它在国际扩散中既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也致力于整合社会和文化元素,以实现更有效的保护成果。^[6]

跨界合作则突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与多元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的能力,这种合作是其全球环境保护活动成功的关键一环。小威廉·布莱尔(William D. Blair Jr.)以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合作保护项目为例,强调其实现保护目标的过程中,与各种利益相关者都建立了多维度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者包括与私人土地所有者、州和联邦政府、私人慈善机构、基金会以及国际组织和个人,这些合作关系对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活动至关重要。^[7]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J. Griffith)和查尔斯·克诺伯(Charles R. Knoeber)从企业捐款被视为购买有价值的输入、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广告效应、环境责任的形象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企业向大自然保护协会捐款的动机是多方面的,此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企业的捐款行为,他们假设了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对企业捐款激励产生影响的可能性,预计新政府时期企业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捐助会有所下降,理由是政府更加宽松的环境政策会减少企业试图通过捐款来获得环境法规缓解的动机。^[8]

在与诸多利益相关者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环保合作的过程中,大自然保护协会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流程与策略,这体现了其在环保领域推动多方合作的领导力以及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大卫·威廉姆森(David Williamson)讨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与企业建立联盟的经验,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建立企业联盟时应当注意几个关键点:伙伴关系需要在组织的所有层面上建立、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来确保战略上的契合、成功的伙伴关系需要双方都做出妥协、管理好各方的期望以及强大的伙伴关系需要借助时间、承诺和资金的投入来维护。^[9]玛莎·平斯(Martha Pings)在其研究中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大自然保护协会)与美国土壤协会(ASA)、作物科学协会(CSSA)和土壤科学协会(SSSA)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合作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

目标,即通过科学实践来增强美国种植者的土壤健康和营养管理能力。平斯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支持专业认证、计划会议和推动政策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促进土壤健康和农业土地的可持续性具有积极意义。^[10]

上述概念不仅揭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活动和影响力,而且展示了其在不同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些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又为大自然保护协会提供了一个不断进化和改进的框架,使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制定更具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并与各种合作伙伴建立和维护关系。对于学术工作的开展而言,这也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环境保护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同时也为我们本国涉及到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理解框架。

二、保护策略:跨学科、多领域的实践

保护策略是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展工作的基石,它决定了组织如何有效地应对全球环境挑战。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并非孤立,而是在广泛的学科领域内进行整合和创新。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体现了一种多维度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包括了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还包括了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见解。通过不断探索和应用多学科知识,大自然保护协会得以确保其保护措施既科学又具有可操作性,而这种方式还为其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使其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保护计划。

此外,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也展现了一种多领域的实践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了与政府、企业、社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专长,共同推进保护项目的实施。这种跨界合作不仅提高了保护工作的效率,也增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总体而言,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可以被划分为生态保护、社会参与和政策倡导等几个关键领域,其中,土地保护是大自然保护协会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全面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社会参与指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促进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参与方面所做的努力。而政策倡导则主要关注的是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政策层面上推动环境保护的努力。这包括与政府合作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政策、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协议的谈判等。进一步,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还体现在其对创新技术的运用以及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上。可以看出,通过这种多维度的保护策略,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综合性、适应性、参与性、创新性、持续性等方面体现了其展现了其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的专业性和领导力。

在现有的关于大自然保护协会跨学科、多领域的实践的文献中,有几个关键点比较具备代表性:土地信托(Land Trust)、自然保护系统工程(Conservation by Design)、新技术运用。

(一) 土地信托

土地信托基金具体影响大都市地区的增长模式和农村土地景观的特征,不是通过分区和监管控制,而是通过直接的土地交易。在这方面,他们更像是当地的土地开发公司,而不是倡导更严格的土地使用控制和开发限制的典型环境组织。^[11]正如在大自然保护协会成立之初,工作人员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描述:“我们以传统的方式拯救土地——我们购买土地”。土地信托基金与塞拉俱乐部或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倡导组织截然不同。除了通过游说和宣传以获得资金(用于收购或管理)的行动外,早期的土地信托团体避免让人觉得他们与政府监管或权力有关联。私人土地保护活动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根植于美国土地信托运动的文化中。^[12]

理查德·布鲁尔(Richard Brewer)认为“土地保护和爵士乐一样,是美国的发明。”并且该想法是对19世纪下半叶自然景观迅速、持续破坏的回应。^[13]布鲁尔指出,到2001年,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美国已保护了超过1200万英亩的生态重要栖息地,并在全球其他地方帮助保护了超过6000万英亩的土地。一方面,他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成就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争议,如提到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创始人维克多·谢尔福德(Victor Shelford)对组织发展方向的担忧。布鲁尔展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土地信托的典范,其在推动土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and 影响力。同时,他也提出了对土地信托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和挑战。包括如何持续扩大保护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确保保护措施的有效性。^{[13]185-216}

多米尼克·帕克(Dominic P. Parker)和沃尔特·瑟曼(Walter N. Thurman)在其研究中提到,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全国最大的土地信托组织,与其他1500多个小型信托组织在土地保护方面存在不同之处。在与土地信托联盟(LTA)的对比中,两人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一个大型的土地信托组织,与小型的LTA信托在目标和运作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大自然保护协会更注重于保护和增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而LTA信托则更多地提供开放空间的景观保护。在土地保护策略上,大自然保护协会更倾向于主动购买土地和保护地役权,而LTA信托则更多依赖于接受捐赠。此外,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运作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其资金筹集和项目分配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面联邦土地计划时,大自然保护协会表现出了“Crowding in”(即联邦土地保护的增加促进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土地保护活动)的现象,他们认为这与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目标和运作策略有关。^[14]

通过采访调查、实例分析的方式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土地保护进行研究的学者,当属简·迪夫利(Jane Difley)。

她调查了大自然保护协会波士顿办事处的行为活动,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土地保护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提供科学支持和工具方面。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恢复力土地测绘工具被多个土地信托用来评估潜在的土地或地役权收购,这有助于土地保护工作更科学、更系统地进行。该工具还考虑到土地的恢复力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也表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土地保护工作中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15]

(二) 自然保护系统工程 (Conservation by Design)

与土地信托不同,大自然保护协会提出的“自然保护系统工程”旨在位于不同地区进行保护活动时确保有效性。大自然保护协会借鉴了生态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生态保护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具体可以划分为生态结构性保护、生态文化性保护以及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生态政策性保护等。

在生态结构性保护中,大自然保护协会关注的是生态系统中物种多样性、栖息地完整性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护。里德·诺斯 (Reed F. Noss) 认为,虽然大自然保护协会已经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但为了更全面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完整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要将保护工作扩展到景观层面。这包括评估每个主要群落类型的干扰制度和再生模式,考虑群落类型和发育阶段的功能组合 (景观马赛克),以及考虑场所周围的景观环境 (如周围栖息地类型和连通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保护那些跨越不同栖息地类型的物种,以及那些依赖于特定生态过程和干扰制度的生态系统功能。^[16]布莱恩·里希特 (Brian D. Richter) 则更加强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 (大自然保护协会) 在生态系统层面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评估物种和群落的稀有性、跟踪它们的位置和生态状况,以及为关键栖息地提供保护管理,已经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的增加,大自然保护协会正在将其重点转移到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层面保护活动上。这种转移的挑战在于在可持续生态系统的背景下构建可持续的人类经济,这需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改善对系统相互依赖性和生态系统过程的理解,以及进行关键的生物-水文研究。^[17]可见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生态系统层面的保护活动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关键策略,并且这种保护活动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持和多方协作。多利亚·戈登 (Doria R. Gordon) 等人的研究更侧重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结构性方法,这包括确定生态区域组合、保护区域和保护目标,以及开发和实施保护策略。大自然保护协会特别关注生态完整性的概念,并通过关键生态属性和指标来评估保护目标的状态。此外,她们还提到了监测计划的重要性,这是确保保护行动有效性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这种结构化的方法,大自然保护协会能够更科学、更系统地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并确保其保护努力能够产生积极的变化。^[18]

约瑟夫·基塞克 (Joseph M Kiesecker) 等人重点研究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地役权,认为这是一种在工作景观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它限制了特定的土地使用方式,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仍允许私人所有权和经济活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地役权大多数位于高保护优先级的区域,并且大多数与受保护区域相邻,几乎所有的保护地役权都有明确的生物保护目标。保护地役权的战略部署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动,即最近设立的保护地役权更可能是大型的,并且更可能是购买而非捐赠的。基塞克还强调到,为了确保公共资金和税收优惠得到妥善使用,保护地役权必须制定实用的监测准则,并战略性地考虑何时以及如何进行监测。^[19]

生态文化性保护是一种综合性的保护策略,其核心在于尊重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该策略倡导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同时,推动社会关怀的深化和地区包容性的发展,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性增长。此外,它还强调边缘化群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确保这些群体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获得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回报。杰弗里·哈德斯提 (Jeffrey L. Hardesty) 等人对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的案例进行研究,展示了其如何将生态系统的动态与机构规划相结合,以实现区域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表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生态保护中不仅关注生态本身的健康,也注重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克里斯汀·霍克斯 (Kristen Hawkes) 在其文章中讨论了资源所有权对资源使用的影响,提出了两种模式:“公地悲剧”和“公共物品问题”,这两种模式都与资源的非私有性质有关,但它们对资源提取水平有不同的影响。这强调了所有权在资源使用中的重要作用,大自然保护协会需要在生态保护中更多地考虑资源所有权的分配和管理。^[20]阿德里安娜·卡谢林 (Adrienne Cachelin) 等人通过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翅膀与水”计划的评估,指出环境教育项目的成功不应该仅仅基于参与者的认知成果,还应该包括情感反应的评估。她们发现实地学习经历可能对学生的情感反应有积极影响,包括培养保护情感和增强学习动机。因此建议未来的评估应该包括随机参与者选择、更少结构化的认知评估、不包括引导想象的情感评估,以及调整评估提示以适应没有实地经验的学生。^[21]

也有部分研究者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性策略持批判态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蒙特·伯克 (Monte Burke),他认为大自然保护协会在追求生态保护的同时,与商业利益的合作可能导致环保原则的妥协。通过引用不同人物的观点,展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环保主义者中的争议地位,暗示大自然保护协会可能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

了生态保护的纯粹性。他还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经营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保护,但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和符合环保原则,仍有待进一步讨论。^[22]

相比于传统的生态保护模式,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进步更多体现在其明确提出了生态政策性保护。这种保护视角认为,生态保护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来保障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凯伦·金(Karen N. King)和辛西娅·林奇(Cynthia V. Lynch)通过考察大自然保护协会俄亥俄州分会的志愿者,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志愿者主要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参与环保活动,特别是出于“为大自然做点什么”的愿望。尽管志愿者有着多种参与动机,但利他主义是主要的驱动力。志愿者管理机构应该了解每个志愿者的动机,并确定最重要的动机,以便更有效地分配任务和提供相应的支持。她们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探讨环保组织的志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如何吸引更多非传统志愿者参与环保活动。^[23]

一份关于大自然保护协会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恢复中心(NOAA Restoration Center)十年合作的亮点报告详细描述了双方在生态恢复项目上的合作成果,包括湿地、河流、海草床、牡蛎礁和珊瑚礁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恢复工作。在这些项目中,大自然保护协会和 NOAA 的合作不仅关注于生态恢复的实践,也涉及到了生态政策的制定和推动。伊丽莎白·施拉克(Elizabeth C. Schrack)等人指出,在政策层面,这些项目提高了公众对健康海岸线的需求意识,并通过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社区参与,推动了更大规模的恢复工作。^[24]

(三) 新技术运用

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新技术的运用上主要聚焦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是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实施上。这些方案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服务来降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增强其韧性,并在具体实践上,运用了多种技术手段,包括人工智能、遥感技术、生物声学等。

尼科尔·鲁斯马尼耶(Nicole Rousmaniere)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采取的创新策略和技术的重要性。通过运用新技术和工具,包括 IHA 软件、水文模型和经济激励计划等,大自然保护协会不仅在特定地点取得了成功,而且通过分享这些工具和策略,进一步促进了全球范围内更有效的淡水保护。鲁斯马尼耶还指出,面对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在满足人类对水的需求和保护不可替代的淡水生态系统之间找到平衡。通过合作和共享经验,大自然保护协会得以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25]

埃斯特万·穆尔达文(Esteban H. Muldavin)等人关注到了 GIS 和遥感技术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环保策略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通过遥感技术可以有效地评估和识别具有高保护价值的干旱生态系统中的草原地点。其开发的生物多样性指数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方法,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快速应用,并与保护规划直接相关。尽管在不同地质基质和时间限制下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校准,但这种方法为保护生物学实践中使用遥感图像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工具,有助于快速和高效地检测整个奇瓦瓦沙漠生态区的干旱和半干旱草原。^[26]

综上,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三个策略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自然保护框架。通过土地信托确保了关键区域的长期保护,自然保护系统工程实现了跨地域的生态修复,而新技术的运用则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创新的工具和方法。这种多维度、跨学科的保护策略,不仅提高了其开展保护工作的效率,也为全球自然保护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三、理论模式:源于“荒野”,超越“荒野”

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环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将“荒野”(Wilderness)视为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其保护不仅是对自然原貌的维护,更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捍卫。“荒野”概念与环保主义相结合,反映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对自然保护的全面和深入理解,也体现了其在实践中推动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平衡的努力。

关于美国历史上“荒野”概念的演变,可从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的文章中找到线索,即从早期定居者将其视为需征服的敌人,到逐渐认识到其美学和科学价值,再到 19 世纪浪漫主义思潮下的国家骄傲,直至 20 世纪对荒野保护意识的兴起和国家公园的建立。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公众开始重视荒野对现代生活的平衡作用和生态重要性,导致对荒野保护的认可和政策支持,反映出美国社会对自然环境价值观的积极转变。^[27]

莫斯利和马伦认为大自然保护协会起源于西方的“荒野”概念,其中自然和人类社区被视为是割裂的。1915 年美国生态学会成立,一些领先的美国自然科学家不满意仅仅进行学术研究,他们组成了一个激进的分支,最终在 20 世纪 40 年代脱离了该学会,决心采取“直接行动”来拯救受到威胁的自然区域,而不仅仅是研究它们的消亡,这才有了 1951 年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正式成立。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关注美国本土的私有土地购置和自然保护区管理,逐渐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保护策略也从单一的荒野保护转向了更加综合的方法,包括在不同地理和政治尺度上工作,以及将社会和文化因素纳入保护规划中。^[6]

艾比·金奇(Abby J. Kinchy)探讨了生态学家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和生态学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美国生态研究自然区域保护委员会如何在 1945 年因修改章程以限制部分成员对参与政府立法的讨论,从而导致次年委员会的分裂,这反映了科学界如何在内部辩论和外部压力下,重新定义其专业边界和与政府的关系。该委

员会还致力于推动立法以保护包括国家公园和纪念碑在内的自然荒野地区,冰川湾纪念碑 (Glacier Bay Monument) 的建立便是其保护荒野地区的一个实例。此过程显示了彼时生态学家对荒野保护这一概念的扩展及其实际行动,并为其后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正式创建奠定了理论与历史基调。^[28]

1950 年的克利夫兰会议预告了次年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成立以及协会内的新官员和新成员,在协会的目标和工作议程上,会议提到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保护每个独特自然区域内所有生物群落的足够样本,并鼓励对这些群落的研究,这表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初创阶段就将荒野保护纳入其重要议程。^[29]在大自然保护协会此后的发展中,对于“荒野”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其具体的环保实践中得以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自然保护协会逐渐认识到荒野不仅仅是未被人类触及的自然环境,它还包括那些即使受到一定人为干扰,但仍保持着自然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的地区。这种理解的拓展促使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保护策略上采取了更为包容和综合的方法。

卡伦·波阿尼 (Karen A. Poiani) 等人分析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保护荒野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综合性和动态性规划方法,即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规划流程是一个跨学科的、灵活的框架,旨在通过结合传统保护活动与新兴的生态系统管理概念,来识别和保护关键的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该流程不仅关注于保护目标的识别和保护,还包括了对威胁的评估、利益相关者的分析、保护策略的开发以及对规划实施的持续监测和修订。^[30]

彼得·拉森 (Peter B. Larsen) 讨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推动荒野保护方面的策略和行动,包括通过其项目和合作伙伴关系来保护和恢复荒野地区。拉森强调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荒野保护中的重要角色和影响力,指出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其项目和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荒野地区的恢复。同时,他还指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平衡保护目标与当地社区的需求、如何有效地管理其资源以及如何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大自然保护协会在秘鲁亚马逊地区的活动案例研究,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推动生物圈保护区建立和支持当地社区环境保护项目方面的做出了巨大努力,拉森认为大自然保护协会是一个在全球荒野保护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组织,但其策略和方法需要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31]

以上文献表明,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理论模式在起源上与对“荒野”的保护紧密相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理论和实践已经超越了对荒野概念的传统理解,并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化,逐渐转变为一种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生态保护策略。

四、结语

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一个跨地域、国界的非政府组织,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践和理论贡献是显著的。现有的相关文献不仅展示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不同文化和生态系统中的适应性和创新性,也彰显了其在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引领性作用。

(一) 对现有研究的评析

上述文献论述探讨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发展历程、策略实施以及理论构建,展现了其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的多维贡献。现有研究显示,学术界对其工作的评价呈现出多样化、跨学科和多角度的特点。已有文献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评价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跨越了不同的学科领域,并且从多个角度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工作进行了审视。尽管研究者们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理解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妨碍我们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深入分析大自然保护协会工作模式和成果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在理论探讨层面,研究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解析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工作效果,其中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和环保理念共同构成了其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中的核心优势。通过在土地信托、保护设计以及新技术运用上的不断努力,大自然保护协会不仅提升了自身的保护能力,也为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着眼于全球视野,对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政策制度分析揭示了其如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环境中寻求合作与发展。大自然保护协会积极适应和利用各种政策框架,通过与政府、企业和社区的合作,推动了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种宏观层面的策略部署,使得大自然保护协会能够在多变的政策环境中保持灵活性和前瞻性,有效地推进其环境保护目标。

(二) 现实意义与思考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保护策略和理论模式为中国提供了环境保护本土化和跨领域合作的宝贵经验。在中国,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挑战,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实践启示我们需制定符合国情的环境保护政策,并通过跨学科合作,整合各方资源,形成环境保护的合力。同时,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政策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和国际合作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鼓励中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向世界展示中国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跨地域活动及其所引发的争议,为其他环保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警示。在开展跨国环保活动时,相关组织需深入进行本土化反思与前瞻性规划,积极探索适应不同国情的环境保护路径。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其跨国实践中虽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项环保议题,但也面临着一系列批评,主要集中在文

化敏感性不足、限制当地经济活动、与政府合作的动机和影响、对当地知识的代表性和认可不足、规模和影响力上的担忧、保护策略的适应性问题、社区参与度不足、项目持续性和可持续性问题的矛盾。可见，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文化代表性、知识权威性和社区参与度方面尚存有进步空间，尤其在实施跨国保护项目时需要更深入地考虑当地社会经济需求和文化多样性，确保其保护工作既有效又具有社会公正性。

展望未来，大自然保护协会将继续在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议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为了有效推动这一进程，大自然保护协会作为非政府组织，应充分利用其灵活性和跨领域的协作能力，发挥其在促进环境政策创新、实施和监督方面的独特优势，积极深化各方协作，促进跨学科的整合，在全球环境政策的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开展跨国活动时，大自然保护协会需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发挥非政府组织的适应性优势，综合考虑地方实际情况与发展需求，坚决避免介入意识形态斗争或被用作政治工具。通过这些努力，大自然保护协会将为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共同塑造一个生态平衡与社会繁荣并重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 [1] Birchard B. Nature's Keepers: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How the Nature Conservancy Became the Largest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M]. John Wiley and Sons, 2005: 9-31.
- [2] Sawhill J C. The Nature Conservancy[J].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96, 38(5): 43-44.
- [3] Willow A J. The Shifting Topology of Environmentalism: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and Conceptual Trends in Two North American Organizational Histories[J]. Nature and Culture, 2015, 10(2): 157-177.
- [4] Chaplin S J. Natural Area Programs of The Nature Conservancy[J]. Transactions of the Kansas Academy of Science, 1987, 91(1-2): 7-10.
- [5] 董史烈. 国际援助中的环境非政府组织: 运行机制与经验启示[J]. 国外社会科学, 2021(1): 76-84.
- [6] Moseley R K, Mullen R B. Mapping Shangrila: Contested Landscapes i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129-152.
- [7] Blair W D Jr. The Nature Conservancy: Conservation Through Cooperation[J]. Journal of Forest History, 1986, 30(1): 37-41.
- [8] Griffith J J, Knoeber C R. Why do Corpor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Nature Conservancy?[J]. Public Choice, 1986, 49(1): 69-77.
- [9] Williamson D.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Experiences with Corporate Alliances[J]. Social Marketing Quarterly, 1999, 5(3): 13.
- [10] Pings M. Advancing a Shared Goal: Societies, The Nature Conservancy Sig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J]. Crops and Soils, 2017, 62(9): 28.
- [11] Konrad L, Duvernoy G. Land Trusts: 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our Nation[J]. Natural Resources & Environment, 2002, 17(2): 95.
- [12] Johnson L A. The Land Trust Movement in the US. in an Open Fiel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for a Global Private Land Conservation Movement[M].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2014: 2.
- [13] Brewer R. Conservancy: The Land Trust Movement in America[M]. Dartmouth, 2003: 14.
- [14] Parker D P, Thurman W N. Crowding out Open Space: The Effects of Federal Land Programs on Private Land Trust Conservation[J]. Land Economics, 2011, 87(2): 202-222.
- [15] Difley J. Standing Tall: Forestry Practices on Lands Conserved by Selected New England Land Trusts[M].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2021: 12-13.
- [16] Noss R F. From Plant Communities to Landscapes in Conservation Inventories: a Look at The Nature Conservancy (USA)[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87, 41: 11-37.
- [17] Richter B D. Ecosystem-Level Conservation at the Nature Conservancy: Growing Needs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Conservation Biology[J]. Journal of the North American Benthological Society, 1993, 12(2): 197-200.
- [18] Gordon D R, et al.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Approach to Measuring Biodiversity Statu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ervation Strategies[M].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12: 1-14.
- [19] Kiesecker J M, et al. Conservation Easements in Contex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ir Use by the Nature Conservancy[J].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7, 5(3): 125-130.

- [20] Changing Ecosystems: Natural and Human Influences[C]. Supplement to Bulletin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7 Annual Meeting Jointly with the Nature Conservancy, Albuquerque, New Mexico, 1997, 78(4): 15.
- [21] Cachelin A, et al. Using the 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 Framework to Inform Program Evaluation: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Wings & Water Wetlands Education Program[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09, 40(2): 2-14.
- [22] Burke M. Companies, People, Ideas-Creative Giving-Eco-Pragmatists-The Nature Conservancy gets in Bed with Developers, Loggers and Oil Drillers[J]. Forbes: Business and Finance, 2001, 3(9): 63-65.
- [23] King K N, Lynch C V. The Motivation of Volunteers in The Nature Conservancy-Ohio Chapter, a Non-Profit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Volunteer Administration, 1998, 16(2): 5-11.
- [24] Schrack E C, et al. Restoration Works: Highlights from a Decade of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Nature Conservancy and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s Restoration Center[M].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12: 1-71.
- [25] Rousmaniere N. Leveraging Our Learning From Freshwater Sites: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Freshwater Learning Center[C]. Proceedings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Federation, 2000(6): 2250-2261.
- [26] Muldavin E H, et al. Indices of Grassland Biodiversity in the Chihuahuan Desert Ecoregion Derived from Remote Sensing[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1, 15(4): 844-855.
- [27] Nash R. The American Wilder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Forest History Newsletter, 1963, 6(4): 2-13.
- [28] Kinchy A J. On The Borders of Post-War Ecology: Struggles over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s Preservation Committee, 1917-1946[J]. Science as Culture, 2006, 15(1): 23-44.
- [29] Program Cleveland Meetings December 27-30, 1950, Announcement Minneapolis Meetings September 5-9, 1951,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ure Conservancy, New Officers, New Members[J]. Bulletin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50(4): 69-76.
- [30] Poiani K A, et al. A Scale-Independent, Site Conservation Planning Framework in the Nature Conservancy[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3(1-3): 143-156.
- [31] Larsen P B. The Good, the Ugly and the Dirty Harry ' s of Conservation: Rethinking the Anthropology of Conservation NGOs[J]. Conservation & Society, 2016, 14(1): 21-33.

From Wilderness to Global Vision: A Review of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TNC)

Research

Chen Lianghong¹

¹*School of Social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Abstract: As the world's leading environmental NGO,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global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Exploring TNC's trajectory across regions and borders can reveal how it has developed a set of innovativ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In the attributional explanation of TNC's success, institutional self-innovation and broad societal collaboration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addition, the concept of habitat conservation has been the guiding philosophy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NC's conservation practices, and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 has provided a clear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emporal clues.

Key words: The Nature Conservanc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systems; social cooperation